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赵志伟 著



Xiandai Yuwen
Jiaoyu Fazhan



上海市
著名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赵志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赵志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

华东师范大学教材出版基金

ISBN 978-7-5617-9581-1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汉语—教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034 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著 者 赵志伟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王 海

责任校对 胡 静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1—1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9581-1/G·5634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绪言 / 1

第一章 从私塾到学堂

——近代语文教育的转轨 /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语文概述 /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语文教育的变迁 / 5

第二章 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

——初期语文课程的设置 / 9

第一节 “癸卯学制”中的“语文课程” / 9

第二节 “癸卯学制”中语文课程意义分析 / 15

第三节 “癸卯学制”颁布时期的国文教学 / 19

第三章 从“国文”到“国语”

——国文课程标准的拟定和发展变化 / 24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和“国文” / 24

第二节 小学“国语”课的确立 / 28

第三节 “壬戌学制”与“国语”、“国文”课程
纲要 / 34

第四节 国语、国文新课程“暂行标准”的
颁布 / 40

第五节 关于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学理
讨论 / 44

第四章 从“蒙学课本”到“国语”、“国文”课本

——民初到 30 年代的国文教材 / 49

第一节 清末的“蒙学课本” / 50

第二节 清末出现的“国文”教科书 / 54

第三节 民国初年国文教科书 / 61

第四节 三四十年代的国文教科书 / 69

第五节 关于语文教材标准的讨论 / 76

第五章 从“教授法”到“教学法”

——西方教学方法的引进与初期语文教学法之探索 / 82

第一节 国外教学方法的引进 / 83

第二节 国文教学法初创期的探索和研究 / 90

第三节 国文教学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 97

第四节 关于作文教学的研究 / 102

第六章 从“国语要旨”到“国文教学概要”

——语文教学研究的新阶段(上) / 111

第一节 张士一与吴研因的小学“国语” / 111

第二节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 / 119

第三节 周铭三等的《中学国语教学法》和陈柱的《国学教学论》 / 122

第四节 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 127

第五节 江苏、上海诸家关于国文教学的讨论 / 133

第七章 从《中学国文教学法》到《文心》

——语文教育研究的新阶段(下) / 145

第一节 阮真和他的国文教学研究 / 145

第二节 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关于国文阅读教学的研究 / 154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其他诸家的研究 / 166

第四节 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 / 174

第五节 小学国语教学法的研究 / 179

第六节 关于大学国文教学的一些研究 / 183

第八章 从“文白之争”到“中学生国文程度”之争

——现代语文教学发展中各种思潮之斗争 / 195

第一节 20年代的“文白之争” / 195

- 第二节 30年代的“文白之争” / 201
- 第三节 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之争和“抢救国文”问题的争论 / 209
- 第四节 40年代对官方教材的一些批评 / 216

第九章 从探讨认识汉字规律到研究儿童心理、测验等

- 现代语文教育中的科学实验研究 / 220
- 第一节 20年代归国留学生关于汉语汉字教学实验研究 / 220
- 第二节 艾伟、龚启昌关于国文学习上的一些特点与规律的研究 / 222
- 第三节 廖世承、陈鹤琴、张九如等人的教学科学实验 / 226
- 第四节 邵爽秋、袁哲、傅彬然应用科学原理入教学法的尝试 / 231
- 第五节 林汉达的《向传统教育挑战》 / 236

第十章 从《教育杂志》到《国文杂志》

-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中的期刊 / 242
- 第一节 早期的综合类教育杂志和副刊 / 242
- 第二节 《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 / 246
- 第三节 《中学生》 / 250
- 第四节 《国文月刊》 / 253
- 第五节 桂林《国文杂志》 / 257

第十一章 从“国文”到“语文”

- 当代语文教学格局的确立 / 263
- 第一节 50年代初语文教学概览 / 263
- 第二节 语文教学思想、方法和教材编写 / 265
- 第三节 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理论教学方法 / 268
- 第四节 中学汉语文学科教学 / 273

后记 / 283

绪言

现代语文教育,一般是指 1904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到 1949 年这一时期的国文国语教育。因为正是“癸卯学制”颁布后,语文单独设科,从旧时代文史、伦理、道德各种教育合一变成了一个专门学科。从最初的“词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到“国文”、“国语”、“语文”,名词的转换也意味着语文教育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各种思潮的斗争、辩论、消长,这里有课程标准的讨论与颁布,教科书的编写及其使用,西方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介绍与引进,中国本土语文教学方法的倡立与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一些语文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有关语文教育的科研的开展、刊物的创办等等。在不到五十年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局面,尽管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与自然灾难之苦,但在语文教育这一阵地,前辈们创立的一切,足以使后人景仰。可以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已经出现了与旧时代迥然不同的一个格局,在语文教育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形而上的理论理念探讨还是形而下的教学方法之实施、教科书的编写,以及考试评价等,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一整套东西。如果不是战乱,这些理论与实践本来是可以为现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服务的。

朱自清先生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是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

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主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哪些是该扬弃的,哪些是该保留的。”^①

朱自清论的是古文学的欣赏,其实对我们研究语文教育来说也一样。

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考察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对我们今天从事语文教育有些什么意义呢?

首先,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王充云,“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论衡·谢短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语文教育是一种母语教育。中国的母语教育至少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不适合时代的东西。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受西方影响下诞生的,至今也有一百余年了,这其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些曲折。在民国时期的五十年中,在对待传统教育方法上,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教学方法上,在探索具有本国本民族特点的语文教学方法上,前辈们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误。但不管怎么样,从总体看,这一时期语文教育领域的建设是成功的,成果是丰硕的。单是把语文由传统的文言教学、贵族教育(殆同于西方的古典语文)成功地转轨为现代的、平民的语文教育(包括文言与白话)的成就,就足以为前辈们树立一个丰碑。了解这一段历史,对树立我们民族自信心、树立对母语教育的信心是十分有好处的。可以使我们克服“言必称布卢姆布鲁纳”的弊端,从自己的历史上汲取思想资源。

其次,考察这一时期语文教育中发生的一些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同时,避免已有过的失误,从而对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癸卯学制”到二三十年代,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在引进借鉴西方的一些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时,前辈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为后来本国的一些语文教育大家探索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模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在“五四”后到30年代初一段时间内,由于新旧思想的对立,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如文言文、国学),在如何借鉴西方的教育思想、方法,如赫尔巴特“四段论”、“道尔顿制”、“启发式教育”、大众语、汉语拼音等等问题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失误处。有的是全盘否定传统,有的是照搬照套不着实际,有的则是急于求成,有的则是受政治思潮的影响等等,而更多的只是一种尝试探讨,故失误也在所难免。尘埃落定的今天,我们有机会对这些事作一些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例如从“设计教

^① 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选自《朱自清全集》卷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学法”、“道尔顿制”的引进尝试及其结果,我们就可以对今天时行的“探究性学习”、“综合性学习”作出较符合实际的估价与预测。对二三十年代一些教育家及广大语文教师对“读经”问题的态度、它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大致可以确定一种“如何看待经典”的态度,从而避免把“经典”与儒家经典、把学习孔子教育思想与“尊孔读经”混为一谈;而 20 年代对课程标准颁布后各地实际教育情况的了解,可以使我们知道: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际的执行实施并不是一回事。所谓“传统”的力量远比想象的要强大,教育上的每一步都需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像美国当代一位教育家杰克逊所说的:“教育的进步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未来方向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我们的乐观倾向就会降低一些了。”^①

第三,可以从微观上学习这一代学人关于语文教学的一些方式方法。

说句实话,现代语文教育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究竟怎样教好语文,尤其如何对待语体文(白话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流行的那种授课模式(有个名词谓“做课”,很形象)究竟是否符合母语教学规律,我是比较怀疑的。对口语与书面语基本一致的文章是否有必要那样解读?为了“发展学生思维”而满堂串问,以代替过去的满堂灌;为了“多元解读”,让学生作各种不着边际的异类解读;为了适应考试则对文章进行条分缕析深文周纳,授课成了“演戏”,是几十年来语文课堂一大奇观。每每我听了这样的“观摩课”、“公开课”,就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语文是这样教的吗?”“我的语文是这样学的吗?”这时我就会想到白马湖春晖中学中一批老师的教学,也会想到王森然在陕西榆林中学的教学,更会想到 1929 年何仲英在评论浙江一师语文课讨论式时的一些话,以及 30 年代阮真在广西批评当时的国文教学的一些话……当我拿起如今那些由无数专家审定的各种教科书时,我就会想到胡适、周作人、朱光潜关于“学国文要从读小说开始”的一段段回忆以及发人深省的话……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兼有新旧学根基又热心于国文教学这个“童蒙事业”的“大家”,在“××大师”、“××学者”如过江之鲫热闹的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听听那一代人说过的话呢?

1967 年,加拿大学者弗莱在纪念加拿大独立一百周年时登上著名的“惠登讲坛”发表了《现代百年》,在回顾 20 世纪所谓“进步理论”时说过一段话:“进步理论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眼前的手段必须为将来的目标作出牺牲,但是我们对未来并不了解,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些目标是否能实现。我们所实实在在知道的,是我们把现在给破坏了。因此所谓进步就一定会奔向更加美好前景

^① 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选自《国际教育展望》卷 25,1993 年,第 470 页。

的想法,已越来越让人看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①弗氏在当时批评的是 20 世纪曾盛行政治经济上的乌托邦。拿来对照教育也未尝不过,就语文教育而言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文字改革、汉语拼音、各种新式的教学方法,近二十年来更是“新理念”、“新名词”迭出,语文教育成了一个大酱缸。在这样情况下提倡返璞归真、回到原点,寻找符合国情的母语教学方式方法不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之故,笔者将近年来为研究生讲课的讲义编成教材,全书以史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对现代语文教育变革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进行考察,其中包括十个专题:一、近代语文教育的转轨;二、初期语文课程的设置;三、国文课程标准的历史发展;四、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与成熟;五、语文教学方法的演进;六、语文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七、语文教育思想的论争;八、语文教育科研的发生发展;九、语文刊物的历史扫描;十、当代语文教育格局的确立。各专题之间互有渗透各有侧重,大体以史为经以事为纬,基本以“述而不作”为原则,间有褒贬的也尽可能本知人论世原则,本以“了解的同情”,决不随意臧否前贤,唐突今人。由于各部分内容多寡不同,叙述也自繁简各别。

本教材本为讲义,大部分内容来自陈必祥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李杏保、顾黄初二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中国现代语文百年事典》、《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前辈之故书,不敢称著述,仿效袁枢抄撮《资治通鉴》做法,成一本“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纪事本末”。窃攀前贤是妄谬之举,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能假以时日,修订成正式教材,则余愿足矣。

赵志伟

于二〇一一年十月

① [加]诺斯洛普·弗莱:《现代百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第一章 从私塾到学堂

——近代语文教育的转轨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语文概述

中国的语文教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大约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语文教育、近代转轨时期的语文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今天是由昨天而来,研究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昨天和前天,割断了历史,也就对今天的许多事看不明白。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过去的历史作一简略的扫描。

一、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从商代算起到清末。古代语文教育并没有单独设科,而是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早在商代,中国已有文字,已具备汉字基本结构。商代已有学校。西周时学校有“大学”、“小学”两类,教学内容为“六艺”。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为“大艺”,“书、数”为“小艺”。所谓“书”即是识字教学。春秋战国时,官学衰落,私学发达,其中以儒墨两家为最著名,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他的有些教育思想和原则可视为后世语文教育思想的发端。春秋的私学仍教授“六艺”,“书计之学”十分普遍。所谓“书计”即书写与计算。

汉代教育以“五经”为课程。真正的语文教育在小

学——书馆、乡塾里发生、发展。当时的教育分为两级：第一是蒙学儿童学字书，如《仓颉篇》、《史籀篇》，首先是识字。第二是诵读《论语》、《孝经》，接受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并教授“六书”。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承袭汉制，蒙学仍教学生识字读书，然后进入读经典阶段。除字书、《论语》、《孝经》外，一些史传读物也成为教材，书法也在蒙学中成重要内容。蒙学教材出现了《急就章》、《千字文》一类韵语读物。

隋唐时期的官学和私学受科举制影响，除识字、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外，诗、赋学习和写作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内容。蒙学教材出现了《太公家教》、《兔园册》、《蒙求》等一些集识字、文史典故、道德训诫为一体的读物，因为科举考试要考“试律师”（试贴诗），所以一些读书人为了应试，将《昭明文选》作为教材加以熟读，当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熟语。（陆游《老学庵笔记》）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教育最发达的时期，读书人之多是一大特点，从统治者到一些著名学者都关心热衷于教育，识字、写字、诵读儒家经典、学习诗赋，准备科举的学习路线没有改变。与前代不同的是，宋代一些学者非常关心蒙学教育，朱熹、吕祖谦、吕本中等，他们有的亲自为蒙学制订课程，有的编写教材。如王应麟（一说区适子）所编的《三字经》，再如吕祖谦编的《东莱博议》、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元代的语文教育虽不如宋代发达，但也出现了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日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课程计划，也是语文教育的重要文件，它包括了语文的课程、教材、读法、教法等内容。

明清时期的语文教育仍受科举影响，“四书”、“五经”作为学校的主要课程。识字、写字、诗赋、作文训练，然后进入读经、应试阶段，一如前代。朗读背诵、模仿写作诗文，仍然是蒙学语文教育的主要手段。值得称道的是，明清之际蒙学教材丰富多样，出现了《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一类优秀的读物，同时出现了一些研究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著述。如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王筠的《教童子法》等，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亮点。唐彪《读书作文谱》共有十二卷，将读书、作文、修辞、书法、考试（科举）等问题详细阐述，引入历代大家之说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读写结合、博约兼济，尤其主张将“古文”与“时文”分别训练，认为读“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不同，要求分开阅读区别对待等看法，均为深刻见解。此书可称为一本系统的语文教学法专著。而王筠的《教童子法》篇幅稍小于《读书作文谱》，重点在论述小学，对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基本训练有精辟论述，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和中学语文教学法专著。此两书表明清代语文教学研究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

二、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传统,简言之有以下特点:

1. 语文教育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百科知识结合为一体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没有单独设科;语文是同经学等内容融为一体的。在奴隶社会,商代学校大多学习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学的知识技能;周代学校以“六艺”为基本课程。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8岁入小学,“学小艺,履小节”;15岁入大学,“学大艺,履大节”。所谓“小艺”即书、数;所谓“大艺”即礼、乐、射、御。其中“书”、“礼”、“乐”与语文教育有关。汉代学校以“五经”为课程。隋唐以后直至清末,学校教育与科举有密切的联系,学校教育(包括官学私学或半官方里的书院)也呈现出双轨制——一部分人由蒙学学习然后经学、史学最后走科举道路;更多的人只是有机会在蒙学阶段接受教育。但不管如何,从汉代直至明清,儒家学说成为各类课程的指导思想,它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塾、乡学、书馆、经馆起着指导性作用,语文教育的总目标就是通过识字——读书教育,达到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才的总目标,所有蒙学教材都贯穿这一思想。

2. 语文教育重视基本训练主张循序渐进

传统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首先是识字教学,这是由汉字是义符文字属表意系统这一特点决定的。“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被奉为原则,文字的音韵训练的学习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而这一切又是从识字开始的。中国古代蒙学以集中识字为起始,在较短时期内识两千字左右,然后再教以阅读吟诵。为适应识字教学,从秦汉开始,历代都有数量众多的识字教材出现,从“三仓”(《仓颉》、《爰历》、《史籀》、《急就章》、《千字文》)到明清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种教材选编形式为韵语、历史故事、诗歌等,句式整齐、音韵谐调,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背诵与记忆。

其次是写字教学,由于汉字所独有的图案美,书法成为中国的国粹,因此写字教学是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从汉代起便受到重视,隋唐以后更进入了考试范围,唐宋有“书学”一科,学校也有相应的课程,明清则以能写“台阁体”、“馆阁体”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基本条件之一。历代也有教授书法的专门人才和著作。书法教学从蒙学到国子监、太学都受到重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才被打破。

第三,重视朗读与背诵。传统语文重视积累和感悟,熟读成诵、腹有诗书是提高理解力和写作能力的根本途径,加上蒙学教材以及考试所需要诗赋多为韵语,故从秦汉到清末乃至现代,读与背是语文学习的基本途径,“诗教”是中国历代奉行的原则。从三国时董遇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到宋代朱熹等人要求读书须“三到”:眼到、口到、心到。读的目的是为了记忆,所以读以后还需诵,更重要的是背。为了有利背诵,熟读之外也要求读思结合反复涵泳深入体味。这种背诵记忆的目的一方面是“诗教”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培养语感,为转化写作作准备。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现代。但是这种读与背的方法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片面重视感性、重视实践,往往会忽视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尤其小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到了明清之际,科举考试限于《四书》、《五经》等经义内容,不少学校和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经书、熟诵注疏”,更扼制了学生知识与智力的发展,这一点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诟病。例如,顾炎武称之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①。“进士不读《史记》,举人不知欧苏”的现象也出现了。当然,能兼顾学业与科举两头聪明的读书人也是不少的。

第四,传统语文教学还重视循序渐进,反对读书“凌节”和“躐等”。先秦的《学记》就提出“杂施而不孙(顺)则坏乱而不修”。历代教育家如宋代的张载、朱熹、陆九渊直到清代的陆陇其、章学诚等都强调这一点。宋以后各种学校都有比较严密的“学规”、“章程”,详细规定从小学生到成人的读书的课程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例如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以朱熹“读书明理”、“朱子读书法”为据,规定了学习经史之程序和具体的读书方法,学生从5岁到15岁再到成人,何时读什么书,用什么方法,直到最后成年时“专力学文,练习文字,准备考试”。当时曾颁行郡邑学官,作为模式。

3. 语文学习提倡“质疑”、“问难”

古代的语文教育虽存在着“死记硬背”的弊端,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提倡“问”和“议”也是优良传统之一,从孔子的“学思结合”、“不耻下问”,孟子的“多问则裕”、“自得之”、“尽信书不如无书”,直至宋儒提倡“读书存疑”、“于不疑处有疑”,都是传统教育中优良的地方。朱熹更是有一整套读书方法。清代唐彪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提倡师生互相驳回(《父师善诱法》);王筠更进一步主张:对不善提问的学生,老师要加以诱导(《教童子法》)。唐五代以后的书院和比较高一级的经馆都有师生就某个问题进行辩驳的活动。当然这种“问难”、“议论”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秦克成点校本,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83页。

一般都出现在年龄层次较高的学生中,没有被广泛地应用到蒙学中去。

4. 语文训练注意读写结合,博约兼济

传统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口语与局面语脱节的,一般人认为送孩子上学首先是来学习读写的。所以十分重视读写结合。首先强调多读,读得多、记得牢、思考深入,写起文章来便能“取之左右逢其源”。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被中国人奉为主臬。元代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里更用史蒙卿的话概括为:“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器”、“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其次是强调读写结合,从模仿到独创。传统的写作训练从隋唐起可称为“双轨制”:一方面学写古文,以秦汉文章和历代名人佳作为榜样;另一方面学写“八股文”和“策论”,唐宋学写策论、诗赋,明清写“制艺”(八股文)、策论、试帖诗。两者兼顾不偏废,钱钟书称之为“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①,无论哪一级哪一类学校都需要教两类文章的写作。例如著名教育家颜元(习斋)反对程朱理学,但在他办的学校里也有“帖括斋”(学写八股文等应试诗文)。

在漫长的三千多年间,中国的语文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除上举几条外,还有关于读书的精读与泛读结合、从幼年起便注意“对对子”训练,重视声律、音韵、修辞、轻语法,重视文章作法等等,这些传统都与汉字汉语的本身特征有关,也与中国民族思维习惯有关。这些传统中,有些东西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也合了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某些原理,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长期受科举影响,所以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偏重感性忽视理性、重功利轻应用、重形式轻内容、重书面轻口语、重知识文化轻思维训练等等。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转型了,文化普及了,它终于落伍于时代,而必须发生变化了。

第二节 中国近代语文教育的变迁

这里的近代是指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期,语言文字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要谈语文教育,必先谈谈整个教育的现状。一般教育史家都认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于19世纪60年代启动的。这一阶段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变动的起始阶段。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学习西方,传

^①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页。

统教育显然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式学堂,如设在北京的京师国文馆和在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

一、近代教育的变迁

从教育角度看,这一时期有以下几股热潮:

1. 兴办教育,建立新式学堂

清末兴办学堂成为一时之风气。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开始,“洋务教育”在中国逐渐发展,到 19 世纪末,清政府在全国公开办了 30 多所新式学堂,有语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东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有工业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等;有军事学堂,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但这些洋务学堂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有体制方面的也有人事方面的,更有经济基础方面的和人的观念等种种原因。

教育方面出现大的变局是在 19 世纪末,“1895 年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到 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6 年盛氏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开辟了近代学校三级(小学、中学、大学)学制,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新式高等师范学院”^①。1898 年,清政府颁令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丁韪良为总教习。这几件事都在近代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在提到近代教育史上这些大事时,还必须指出有两股力量,在兴办学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西方教会学堂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并逐渐向内地发展,从 1818 年苏格兰牧师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开始到 1889 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总数已达 2000 所,学生在 4 万余^②。如果说,政府兴办的学校多着眼于英才教育的话,那么这些教会学校,着眼的是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应当承认这些教会学校的大量涌现,有着“破坏”与“建设”的两重功能,“应当承认,‘西学东渐’是一种合理的历史流动”^③。虽然带有“文化侵略”的成分,但毕竟这些学校充当了新知识的载体,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是一批致力于改良和振兴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官僚和华商,通过各种办法,在“尚富强、启民智、治身心”教育理念下,从培养国家需要的“治才”和“专才”目标出发,创办了许多新式的学校,如上述盛宣怀办的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外,还有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47—48 页。

② 同上,第 29 页。

③ 同上。